

公共舆论与晚清联美问题

马陵合

摘要：“联美”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实现均势外交、制造列强在华互相制衡局面的重要外交理念之一，与东北有关的外债问题是实现联美政策的主要工具。东北地方官员和一些朝廷要员希望引进美国资金，在东北修建一条铁路，以促进东北的经济发展，同时削弱日俄在东北的势力。舆论界对这一策略纷纷发表评论，建言献策。但舆论界在关注、讨论联美问题时，对俄日的抨击构成联美舆论的实质性指向，显现朝野间在外交理念上的差异，难以形成互相支撑的格局。其本质原因是晚清时期的公共舆论在更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对现实政治的评断，没有与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联结，难以形成社会凝聚功能。在这一案例中，关于联美外交的舆论回应既是中国近代舆论与外交互动的起点，也是一种舆论与外交关系的常态形式。

关键词：公共舆论；报纸；新闻传播；联美；外债；外交；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7.9；G219.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1-01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S0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70002)

作者简介：马陵合，安徽南陵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安徽芜湖241000）。

一

公共舆论^①的孕育与发展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它主要是指一个公民团体正式或非正式地通过一定的媒介方式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机构进行批评和监督，其中包括报章舆论对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各种相关报道和评论。

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在西方被称为公共意见或公众意见。它作为“再现社会集合意识并对社会某一事态有影响力的多数人倾向性意见”，^②是现代社会的极为重要的构成因素。近代以来，随着报刊、翻译、出版等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体系更趋完备，

信息流通方便、快捷，开放性也大大增强，也就形成了报章代言模式。报章代言模式通过登载在各种报刊上的新闻报道、时评、论说等来表达社会民众的利益要求和呼声。报刊负责收集、传递信息并为受众提供意见表达空间和表达形式，而受众则对这些信息进行比较和鉴别，作出独立的意义解释和判断，之后又将这些解释与判断反馈给报刊，以互动的方式形成社会公共舆论。这种社会公共舆论经常是以社会的方式与国家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维持着独立的地位。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形下，报章往往通过对外交活动的报道与评论，显现出民间力量对国家事务的介入趋向。一些知识分子明确提出：“舆论者，多数人之意

^① 公共舆论通过言谈或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并往往以拥护或反对、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某一公共问题作公开的评价。通常在具有一致利害关系的社会群体中容易形成共同的舆论。一般认为，公共舆论包含4种因素：(1)存在某个涉及人们共同利益的问题或事件；(2)有许多个人对这个问题或事件发表意见；(3)在这些意见中，必有一种具有共同倾向性的意见；(4)这种共同的意见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产生影响。

^② 马干乐、程渭主编：《舆论学概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见结合而成者也”,“一国之内治外交,且必借舆论为后援”。^①舆论是国民干预政府外交的重要手段已渐成共识。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以公共舆论为主题的研究大致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研究公共舆论本身,其中更多以某种报刊为重点进行相关解读。许纪鼎的《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研究了《东方杂志》如何依靠一批固守着理性、宽容、多元、渐进、调和等基本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构造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公共空间。相关论文涉及的报刊则更多,如《申报》、《大公报》、《时务报》等。^②二是研究公共舆论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关注较多的领域是北洋时期外交事件与公共舆论的关系。^③此外还有若干篇论文进行较为细致的个案研究。^④民初舆论界对于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较晚清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包括巴黎和会在内的诸多外交交涉的最后结局已明确显现出公共舆论与政府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以晚清个案研究为基础揭示近代公共舆论空间形成与其特质的专题论文并不多见。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进程直接影响着民国时期舆论发展的走向,本文拟就晚清鼓噪一时的联美这一外交政策的提出实施,透析公共舆论与国家外交政策间的关联程度,进而对公众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描述和解读,以期从公共舆论的角度来评断清季民族主义的具体展现形式。

二

日俄战后,东北的局势再度紧张。袁世凯

和徐世昌、唐绍仪主张在东三省采取开放主义,借英美势力来开发东北并抑制日本和俄国。具体办法是修建一条由中国控制的铁路,以便加速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削弱日俄在东北的势力。鉴于欧洲各大国除德国外,此时都已成为日本的盟友,唐绍仪建议向美国寻求金钱与外交的支持。唐绍仪早在1905年即主张联美,他说:“除德国外,欧洲列强都公开地牺牲我们,而予日本以种种好处,与日本签订了对我们有害的协定。唯有美国,在远东继续推行一项独立于欧洲外交的外交政策。”^⑤1907年8月17日,清廷召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入觐,徐“密陈三省切要办法四项”,其中之一即要求“联合一国,尤外交切要之图,苟能联属邦交,则各国待我之政策,必为之一变,而我乃得以保存”。^⑥不过,并没有明确提出联美。徐世昌和唐绍仪在具体外交策略上存在差异,但是在借款筑路以求得各国在东北的均势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相比而言,唐绍仪对联美兴趣则更大一些,只是因其地位有限,美国又态度暧昧,致使他赴美国商讨借款并没有实际的结果。

1908年夏,徐世昌、唐绍仪在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的建议下,提出引进美国资金设立东三省银行和建筑铁路的计划。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并不明确,他对崛起的日本怀有好感,认为一个强大的日本有能力为东亚提供秩序和稳定,有利于美国经济活动的扩展。同时,他对中国持蔑视态度,认为中国人懦弱无能,不思进取,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值得美国同情和帮助。所以,1908年11月30日,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美国与日本间却订立《罗脱—高平协定》。这份

① 长舆:《立宪政治与舆论》,《国风报》第1年第13期,1910年6月17日,第2~6页。

② 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刘增合的《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和《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里峰的《汪康年与近代报刊舆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唐小兵的《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自我理解》(《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方平的《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吴果中的《〈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等。

③ 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曾获赠一本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应俊豪所著《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年)。

④ 如杨红林的《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⑤ Michael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52.

⑥ 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9《奏议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6~9页。

协定表面在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却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司戴德批评这个协定“使美国至少在道义上站到了日本一边”。^①唐绍仪苦心经营的联美制日计划暂告流产。

这一时期,日美在远东关系的疏远以及双方的明争暗斗是不争的事实,现实的情势也迫使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家和舆论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出现了美国应尽其所能帮助中国的观点。加上罗斯福即将于1909年离任,这使中美联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纽约的《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在1908年年底曾载文主张中美结盟,这反映了美国舆论界的明显变化。驻美公使伍廷芳曾指出:“近日美人讨论,咸谓中国上下人心公平,相处足称友善,颇有爱敬之情。全国报纸视人心为向背,因而用意注重中国。”^②美国这种舆论动态很快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有人甚至认为联美之说直接源于美国舆论界:“中美同盟之说,始于香港报记者李某,当其游历巴黎,与美国纽约黑拉尔特报访员相晤,告以日本欲独占亚细亚而排斥欧人,并谓中国士夫皆以为日本资金若遍布中土,必向美国宣战,因论中美同盟之益,以保远东平和。黑拉尔特访员遂电报本国,载之报章。该报馆并遣记者往谒中国驻美公使伍君,伍君议论,虽然恫吓日本,然犹谓日本意在吞并中国,不啻紧扼其吭,故华人急谋免祸也。”^③这为此后中国舆论界积极参与对美国联盟政策的讨论提供了一定基础。

徐世昌、唐绍仪无论是在开设东三省银行还是修建新法铁路上,均未获得实质性成果,但他们对继任者的影响是很大的。锡良接任东三省总督后不久,便与美方进行锦璦铁路借款交

涉。1909年,塔夫脱任美国总统后,继续积极推行对华门户开放与金元外交政策,又使清政府看到了一线希望。当时,联美成了政府内部的热门话题。驻日公使胡惟德也在1909年6月向外务部报告称:“两三年来,欧美各国颇不满意于日本官员在东三省之行为,啧有烦言,甚至有英日解盟、美日失好之说。”认为这是中国应主动抓住的机会。他不仅附和当时颇为流行的“联美”之说,还主张对中美关系“尤宜加意维持”。^④

相对来说,中国国内舆论在联美问题上所具有的自由空间有限,掌握的资讯较少,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与美国的交涉处于秘密状态,而且清政府也要求“外务部请飭各报馆,嗣后凡东三省交涉一切往来筹商办理之电报概行禁止登载,即其事经议决宣布,此项筹商交涉之要电,仍不得随意登载”。^⑤当时不少人对这种所谓秘密外交极为不满,认为粤汉铁路所以能赎回,关键在于改变了这种秘密外交:“粤汉铁路其初几于铸铁难移,然以清议哗然,近亦有幡然变计之势,主张废约。”^⑥当时报刊很难直接从国内得到准确消息,主要通过外报转译得知其情况。如《东方杂志》连续多期摘译外报有关诺克斯中立计划和锦璦铁路的情况。

总体来看,舆论界基于对大势的判断,对美国提出的东北铁路中立化的“诺克斯计划”^⑦并不感兴趣。《申报》在评论美国在中国东北的中立化政策时说,“固司马昭之心也,然而日人反对此议,则真所谓哄骗童蒙者”,要求日本先放弃在东北的垄断权。^⑧相反,舆论对美国锦璦铁路计划的兴趣较大,因为它能够真正削弱日俄在东北的势力。舆论希望政府能促成此事,要求速定锦璦合同的呼声日高。上海预备

① 转引自吴心伯《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② 转引自吴心伯《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第19页。

③ 《论华猜忌日本》,《外交报》第202期,1908年11月8日。

④ (清)王彦威辑:《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4,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2年,第27页。

⑤ 《东三省交涉仍主秘密》,《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

⑥ 谷音:《论政府对待外人宜力戒迁缓之策》,《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1906年5月3日。

⑦ 1909年12月14日,诺克斯(Knox Philander)国务卿训令驻俄、日、法、德、中各国大使和代办向各该国政府递交了包含以下两点内容的备忘录:第一,列强共同投资收买东北各铁路,所有权归诸中国,管理权则由列强分享;第二,如第一点做不到,由列强参加锦璦铁路及将来其他东北铁路的投资与建设,并借款给中国,使其赎回现存各铁路。这就是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

⑧ 《日本太欺人哉》,《申报》1910年1月11日。

立宪公会在报上发表社论,认为锦璦铁路为“排俄之论,辞甚激烈”。^①留日学生致电清政府,称锦璦借款不定,则各国阴谋未已。^②俄国公使称:“没有一天中国报纸没有用敌视的方式批评外国人,这些报纸攻击自然主要是针对俄国和日本。”^③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曾有这样的担心:“美国提议一旦公开发表,该国国民势必将议论纷纷,同时不难想象,国民舆论对美国提议势将齐声歌颂,并迫使清政府下定决心。”^④日本的报章包括受日本控制的《盛京时报》认为,中国倡说“排日联美”是“中国近时之倾向,盖欲倚于不应倚而求一时之安者也”。^⑤此时舆论界在谈论东北问题和联美问题时,更多的是对俄日的抨击,这构成联美舆论的实质性内容。舆论的影响力开始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相关方面努力构建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形成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1907年1月,熊希龄曾就设立报馆与外交事上书袁世凯:“今各国对于中国互相竞争,即互相疑忌,时怀一均势之思想。如日于奉天,意在垄断,我可于英、美、德、俄各国所立之报纸以攻击之;德在山东,意在侵略,我可于日、法、英、美各国所立之报纸以诋讪之。其他以此类推,则各国必相持而不敢独肆,中国或可保永久中立之地位矣。”^⑥《大公报》则指出外务部在列强进行侵逼之时,仍“雍容谈笑”,对报馆的外交报道和评论则称之为“造谣”。它认为,“舆论者,主张公理者也,对于政府则代表国民之意思而贡献之,对于外交则为政府之后盾而拥护之。此舆论之天职也”。^⑦在另一篇评论中称,此时是“国民的外交之时代”,国民应成为外交的

“主宰的原动力”,依国民之程度,清政府的外交是“专擅的秘密的糊涂的欺饰的”外交,这已为国民所不容。国民已有关注外交的自觉心,所以我国“渐进国民的外交之时代”,国民完全可以成为外交的后盾。^⑧

1909年10月2日,司戴德代表美国财团和宝林公司同锡良签订了《锦璦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对通过借款筑路实现联美以制日俄并没有表现出坚定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东北的地方官员却在联美以制日俄问题上异常坚决。12月23日,锡良上折强调此路的外交作用,并明确提出联美的重要性:“是借款者,乃兼借其势力,彼以势力换我利权,我即借其势力以巩固疆圉”,借款修锦璦铁路“实有外交上莫大关系”。^⑨1909年年底,美国提出“诺克斯计划”,锦璦铁路成为该方案的一部分。清政府在内外交两个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锦璦铁路问题。1910年1月,外务部在致邮传部和度支部函中承认东三省筑路不同于内地,“东省则重在利用各国之势力,互相牵制,以期保我主权”。“此事果底于成,不特中国行政权不致再有障碍,且各国利益既平,则日俄固无从争雄,英美亦不致垄断”。提出只要能将草合同中有损利权之处作些改动,“似不能不准其续与定义”。同时对所谓“联美”之策也予以承认:“果如美政府所云,得此凭借,可以仗义执言,益资我助,于大局裨益实非浅鲜。”^⑩为了使合同条款能符合清政府的要求,锡良不仅选派与司戴德打过交道、有交涉经验的奉天交涉使邓孝先,还把当时立宪派重要人物郑孝胥从上海邀来参

①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47页。

②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249页。

③ [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6页。

④ 吉林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路权篇》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4页。

⑤ 《专电》,《盛京时报》1910年9月25日。

⑥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1页。

⑦ 《舆论与外交之关系》,《大公报》1908年8月19日。

⑧ 《国民的外交时代》,《大公报》1908年1月23日。

⑨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08~1009页。

⑩ (清)王彦威辑:《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2,第19~21页。